

话语与观念

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演进

刘学照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话语与观念

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演进

刘学照 著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话语与观念：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演进/刘学照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ISBN 978-7-100-12042-5

I. ①话… II. ①刘…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
近代②文化史-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B25②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4278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话语与观念：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演进
刘学照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2042-5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46

定价：120.00元

近代中国思想的转型(代自序)

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国人对国家实现独立和近代化道路的认识构成近代思想史的中心内容,也是中华民族不断觉醒的层级标识。近代中国民族的觉醒意味着中国人思维方式和思想轨迹的变化,这就是从“华夏中心”论、“中华本位”论的一种单一的、“唯我”的思维模式中解脱出来,多维地认识世界,多维地认识中国自身,即全面地看待中国和世界,也就是全面地看待时代和国情。

众所周知,古代中国只有“天下”的术语,没有现在这种“世界”的概念。以往中国人谈国事、论改革,总是“以古论今”,但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不仅论“古今”,而且逐步谈“中外”了。中国人在从这种单一的纵向的思维向多维的横向的思维的变化过程中,逐步产生和拓宽了世界意识。另外,中国以往只有“华夏”、“族”、“类”等术语,没有近代的“民族”、“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概念。鸦片战争以后,主要是洋务运动和中国资本主义发生以后,特别是到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和渐次生长的“民族市场”、“国家主权”、“民族自强”、“民族国家”等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相结合,发展成为近代民族主义和近代爱国主义意识。再之,中国以往只有“时世”、“时局”等术语,没有现在的“时代”的概念,但自近代,特别是 20 世纪初以来,中国人获得了关于“时代”的认识。20 世纪初,中国报刊上出现了“帝国主义时代”、“民族主义时代”、“革命时代”、“国民主义时代”、“竞争的时代”等说法,先进的中国人强调要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显然,这种时代意识的萌生与拓展意味着近代爱国主义意识、世界意识的不断增进。

—

鸦片战争的炮火掀开了近代中国历史的序幕,对鸦片战争所引起的震动

和变化,封建官员和士大夫中有过三种议论。

一是“封关禁海”论。以曾望颜为代表。他们从“中国之御四夷也,来则抚之,贰则绝之,此不易之道也”这种封建传统对外观念出发,认为要“封关禁海”,断绝一切中外贸易是“制夷要策”。^①这种主张遭到林则徐的专折批驳。^②“封关禁海”主张虽在现实面前很快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但在以后许多年内,封建官员和士人中的一些顽固守旧人士仍不时迷恋这种幻梦。

二是“抚夷”论。以耆英、黄恩彤等人为代表。黄恩彤还专门写有《抚夷论》,可谓“抚夷”论的理论家。黄恩彤认为,“该夷之船坚炮烈,断难力敌,亦无术破”。中国即使造炮制船,也“万万不及”,“无制彼之术”。“而中国之所以控制而羁縻之者惟在通商。”这样,“无事则抚以恩,有事则折以信”,就可以使西方侵略势力“俯首帖耳,歌咏皇仁,不复有盗弄潢池之事”。^③“抚夷”论与“封关禁海”论不同,它在某种程度上承认变局,主张通商,有若干合理因素。但从根本上说,它宣扬“患不在外而在内”,宣扬唯武器论和失败主义,宣扬“夷之长技”无法学,失掉抗敌和学习外国信心,主张一味逆来顺受,代表了妥协派的对外态度。它与“封关禁海”论同是封建统治集团中的软弱无能的思想。

三是“师夷制夷”论。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等地主阶级改革派继承了历史上的爱国者们那种忧患意识、发愤思想和求实精神,并赋予日益增多的近代新气息。事实上,鸦片战争前夕,强调“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④的龚自珍,就慷慨悲辛,呼唤风雷,憧憬改革。鸦片战争中,林则徐不断自我克服陈腐观念,注意“洞悉夷情”,并提出“从此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的“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主张,首先开眼看世界。早就深感封建“治术”败坏的魏源,因战败加深了“积感”,发愤作《圣武记》和编《海国图志》,要求“过时而悔”,“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他还表达了要外御强敌,必先内革弊政的思想,认为去除人心之“寐”(即愚昧腐败)和人才之“虚”(即虚骄浮夸)中国政治这两大“积患”,就可以“天日昌”、“风雷行”,^⑤“自修自

① 汤彝:《绝英吉利斤市论》,广雅出版有限公司编辑部编:《鸦片战争文学集》(下),广雅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第1097—1099页。

② 《覆议曾望颜条陈封关禁海事宜折》,《林则徐集》奏稿中,中华书局1965年,第793—797页。

③ 黄恩彤:《抚夷论》,《鸦片战争》(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34—436页。

④ 《壬癸之际胎观第一》,《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2页。

⑤ 《海国图志叙》,《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年,第207—208页。

强”，“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富国强兵”。^① 魏源还说：“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②表现出高度的民族自信。“师夷制夷”论和“抚夷”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反对“封关禁海”，主张开门通商。但正如魏源所指出，“抚夷”论者之“不停贸易也，以养痍”，与他所主张的“不停贸易以自修自强者，天壤胡越”。^③ 因此，林、魏的“师夷制夷”论，既不同于毫无世界知识、昏庸误国的“封关禁海”论，而且也 and 仇视人民、毫无民族自信、因循苟且的“抚夷”论划清了界线。林则徐、魏源的“师夷制夷”论爱国主张，把忧患与发愤、求索与开拓、爱国与重民、御外与内治、民族精神与世界眼光开始结合起来，从而开拓了近代爱国主义潮流的新方向。

应该看到，虽然继林、魏之后，许多人都主张“洞悉夷情”，研究西方，如姚莹有《康輶纪行》、梁廷枏有《海国四说》、徐继畲有《瀛寰志略》等，一时出现了编译介绍西方书籍的热潮。但是，“师夷制夷”论为了“制夷”，有“知夷”和“师夷”两个互相衔接的层次。当时地主阶级改革派中，除林、魏等少数人主张“师夷”外，大多数人还盘桓在“知夷”的层次上，还没有明确主张“师夷长技”，甚至有人认为：“天朝全盛之日，既资其力，又师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学，失体孰甚。”^④ 连思想比较开通的人都拉不下“面子”，反对“师夷长技”，所以林、魏的“师长”说在当时并未成为社会思潮，至于整个清朝统治集团，则认为《南京条约》是“万年和约”，危机已经过去。时人批评：“和议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⑤ 封建统治者仍旧浑浑噩噩，依然故我。

太平天国运动的主要目标是“诛妖救世”，即反对以满族皇帝和贵族为首的清王朝封建统治，用基于基督教一神宇宙观的拜上帝教思想去“点燃”农民群众的造反情绪，建立一个所谓“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人间“天国”。太平天国反清斗争传统影响了孙中山、黄兴等资产阶级革命派。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所表现出的广泛学习西方的革新思想，丰富了中国近代史的思想宝库。

但是，农民阶级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洪秀全改造中国的思想模式，主要

① 《道光洋艘征抚记》上、下，《魏源集》上册，第187、206页。

② 《筹海篇》三，《海国图志》(上)，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31页。

③ 《道光洋艘征抚记》上，《魏源集》上册，第187页。

④ 梁廷枏：《夷氛闻记》卷五，中华书局1959年，第172页。

⑤ 《软尘私议》，《鸦片战争》(五)，第529页。

是“替天行道”、“太平救世”、“改朝换代”等传统农民战争的思想模式。他的“太平救世”思想，实质上是裹着宗教外衣的农民小生产者的平均主义思想。集中体现这种精神的《天朝田亩制度》勾绘了一幅农业社会主义的蓝图。它包含了反封建的合理性、革命性和绝对平均主义的空想性、反动性。它反映了广大农民摆脱封建地主剥削和获得土地的愿望，但它的眼光向后看，企图建立一个“通天下皆一式”的小生产者王国，搞“穷平均”、“无差别境界”，社会必然是停滞、黯淡、灾难。要改变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格局，必须有近代化运动。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初发生了洋务运动。它的中心口号是“自强”和“求富”，即所谓“循用西法以日进于富强”。

“洋务”论由“夷务”论演绎而来。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论逐渐代替“夷务”论，而且含义更加广泛，已非原先“防海”所能尽，于是人们“合交涉、制造、教案、通商诸务，而一概之以一名词焉，曰洋务”。“洋务”成了“一时舆论之所趋向”，“一时之世风”。

1860年前后兴起的洋务思潮有两个源头：一是当权的洋务派官僚，倡言于庙堂和官场，纵论于上；一是不当权的爱国分子，通过条陈、著述和报刊文字，横议于下。在不当权的要求变革的力量中，主体部分是地主阶级改革派分子，如冯桂芬、王韬、薛福成等人。洋务派首领人物都认为“洋务乃圣之时”，他们不仅是洋务的行者，也是洋务的言者。洋务论者拓宽了林、魏等地主阶级改革派开眼看世界的幅度，认定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一场“古今之变局”，强调必须“师其所能，夺其所恃”，^①才能使中国富强，从而增进了民族自强意识。他们高倡“工商立国”的“商战”论，主张兴学育才和走向世界，使中国思想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洋务派首领中，李鸿章是与洋务运动相始终并站在这个潮流前端喜谈洋务和高倡“变法”的人物。就此而言，他是中国早期近代化事业的开拓者。

洋务思潮分为左右两翼，双方在兴办洋务、借法自强方面，与封建顽固思想进行斗争，但他们之间的洋务观具体的歧异仍很多，最大的不同在于是重民还是重官，是以政治改革为本还是以练兵制器为本。一般说来，洋务派官僚倡导“洋务新政”活动都是从维护清朝统治这个根本立场出发，也就是从

^① 《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李鸿章折》，《洋务运动》（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19页。

“重官”的立场出发的。因此,他们大多是“强兵治国”论者,始终把练兵、制器作为洋务事业的重心和出发点。早期维新思想家继承和发展了林、魏等人的民本思想,并把它从“重本抑末”的农本思想的窠臼中解脱出来,置于“以工商立国”的商本论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具有新的社会内容和政治内容的重民思想,甚至提出了近乎西方“主权在民”的新认识。早期维新派的重民思想是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观念的结合,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初步发端。

在整个洋务运动时期,东邻日本始终是国人观察世界、反省自身的重要坐标。作为洋务派的领袖人物李鸿章更是一眼看西方,一眼看东洋,特别是70年代中期以后,他始终注意“防日”。李鸿章的对日观是复杂的,它是由“轻日”、“畏日”、“羨日”、“防日”诸心态错综交织而成的。李鸿章是晚清大员中开眼看日本的第一人,从同治初元起就把喜谈洋务和称引日本结合起来,一直以极其惊羨的目光注视着日本开国后,特别是明治维新后的发展。李鸿章又是洋务运动时期一位最大的“防日”论者。“防东洋尤甚于防西洋”的防务观是“日本狡焉思逞,更甚于西洋各国”的严酷现实的反映。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推动了李鸿章对“洋务自强”的努力,助产了堪称强大的北洋海军,也加强了李鸿章长期坐镇北洋的政治地位。但是,李鸿章的“防日”论始终缠绕着“羈縻为上”的羈縻。他对外十分仗恃成约和公法,非常迷恋“以夷制夷”,绝对禁忌“先发制人”,又保留几分封建官僚的虚骄之气。结果,总是“有武器而不能战”,一再在“圣朝包荒”的自慰下对日“羈縻”。最后招致甲午战争一败涂地,葬送了“洋务自强”在人们心目中的希望。李鸿章“防日”论的是非正误、“洋务自强”的得失成败和李鸿章的历史功罪,有着某种内在的逻辑联系。

甲午中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如梁启超所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①孙中山也说:“中国之初醒,实在中日战役之后。”^②老大中国被经过维新的东邻小邦战败的强烈的历史震撼,使许多中国人从“洋务救国”的梦中惊醒,把中国近代化运动推进到效法西方改革政治的阶段。中国民族内省意识比较强,孔子说过:“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孟子说过:“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甲午战后,中国舆论界很快收起一

① 《戊戌变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96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3年,第20页。

般的“反日”、“仇日”情绪，而强调：“反躬自责，发愤为雄。”康有为提出：“日本维新，仿效西法，法制甚备，与我相近，最易仿摹”，“不妨以强敌为师资”，“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①从而举起“仿日维新”的大旗。资产阶级维新派批评洋务“新政”只是“变事”，不是“变法”，而是“饰粪墙，雕朽木”，“无以救危败”。维新派突破“中体西用”，要求“变器变道”，主张“大变”、“全变”。

与洋务论者相比，维新派对中国近代化路径的认识已有质的变化，其根本的政治目标是“君主立宪”。而具体步骤则先从改革官制入手，强调“不改革官制，一切无由整顿”，这无疑是政治思想上的突破和飞跃。它经济上主张“以商立国”和“定为工国”，大力扶植民间资本即全面推行资本主义工业化。文化上，批判封建纲常伦理，提倡“人权平等”，主张变革科举，兴学育才，广开民智。由于维新派从西方“引进”了进化论和民权说，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在中国知识界起了巨大的解放思想的作用，从而又为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做了思想的准备。这场改革运动“虽骤起而卒蹶，后有作新中国史者，终不得以戊戌为第一章”。^②

1900年中国北方爆发义和团运动，严重搅乱了清朝封建统治秩序，在“南和北战开奇局”的情势下，上海思想舆论界异常活跃。上海报刊舆论中凸显出以往所罕见的东南意识，反映了正在兴起的上海以及东南绅商阶层的愿望和要求。这种东南意识在年初有关“建储事件”舆论中已初见端倪，但更集中地显现在关于义和团的舆论中。先是6月初，以上海商人的名义对清廷上谕倾向主“抚”表示“震动”和愤懑。继而到6月中下旬以后，上海各报大力宣传东南“互保”思想，抨击“权奸”的“矫旨”、“乱命”，申言只有“保南”才能“存国”。及至联军攻陷北京，清廷“西迁”之后，更从“党祸”的视角评析时局，认为“中国以顽固守旧酿大祸”，主张“迁都南京”、“皇上复辟”、“帝党复用”、“新政再行”。显然，这种从上海、东南和南方的视角立论的东南意识，表现出上海以及南方绅商关心时局发展和国家命运的社会主体思想，以及从中国自身政治对所谓“内忧外患”进行反思的内省意识。“联盟岂第全商务，抗命方能保圣朝。”^③对至尊的清廷来说，东南意识又带有一种“抗命”的特征。因此，这种时论的出现是晚清史乃至中国近代史上极不寻常的现象，其影响是深

①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213页。

② 梁启超：《公祭康南海先生文》，《饮冰室合集》文集四十四（上），中华书局1932年，第30页。

③ 陆保璜编：《满清稗史》第17册，广益书局1913年。

远的。

历史的发展是历史的阶段性和历史的连续性的辩证统一。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往往是历史的诸多因素前推后拥的结果。龚自珍吟叹“独倚东南涕泪多”，曾国藩申言“今日事应以东南为主”，京师“首善”，但“被现代化”却首先发生在东南……这些都可看作产生“东南意识”的远因。但“东南意识”在庚子年间凸显，实主要为义和团运动的一件历史副产品。义和团运动既反抗和阻遏了列强瓜分中国的图谋，又严重打乱了清朝的封建统治秩序及其传统的内重外轻的权力结构，如同《中外日报》所言，在原有“满汉”、“帝后”、“新旧”界限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南北的界限。从庚子时论中的“东南意识”的主要内涵来看，这种“南北”界限的地域上的意义还只是外观上的，就其实质而言，它恰是“满汉”、“帝后”、“新旧”等界限的扩大和深化。

思想变革往往是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的先行，而它又通常是与一定的“话语”变换和“话语”革新相联系的。如与戊戌时论以及洋务时论相比，庚子时论中出现了以往所未见或少见的新术语和新话题，例如“满党”、“满贼”、“无知满员”、“北京贼政府”、“觉罗氏江山破碎”、“推翻满政府之言”、“南北分疆而离立”、“合诸省为一联邦”、“东南人心”、“东南半壁”、“东南变局”、“迁都南京”……这些新话语和新表述是信息交流的新工具，又是变革的种子，在传播中被演绎、复制和引申，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模式，影响着上海、东南乃至全国的政治气候。历史运动的作用是直接的，又往往是迂回的。固然，庚子时论中的话语大多数仍然是旧话语，庚子时论中的“东南意识”的主流还是在“延宗社”的框子里做文章，它对当时清朝统治的“向心力”仍大于“离心力”。但后来，这种“东南意识”与“共和革命”潮流相结合，在推翻清朝、定都南京、建立民国的历史变革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也侧面说明义和团运动与辛亥革命的某种历史联系。

二

中国近代化的启动始于洋务运动。由于以清政府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衰败，洋务运动的近代化开头文章没有做好，致使晚清近代化潮流一波三折。一批受西方思想影响，与传统政治文化关系较浅的青年志士，以

孙中山为代表，深感“非推翻改造无以救中国”，^①终于1911年10月10日爆发武昌起义，导致清政府被推翻，结束了封建帝制，创建了中华民国。对于辛亥革命，如果不仅仅从其性质方面给它定名，而着眼从历史的本义去为之定名（对性质的分析是对历史事件本身的一种理解，实际上是“他义”），那么就可以形成这样的认识：“辛亥革命的根本性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就其主要内容和主要特征来说，是一次实践‘民主共和国方案’的‘共和革命’。”^②事实上，清末革命党人（如李石曾）当时也称这场革命为“共和革命”。孙中山在民国初年追述革命缘起时也认定自己所倡导的革命是“共和革命”。所以，把“共和革命”作为辛亥革命的别称是完全符合历史的本义和革命党人的原义的。基于同样理由，作为辛亥革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准备和表现的清末革命思潮，可以称之为“共和革命思潮”。应该认为，“共和革命”体现了同盟会革命纲领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统一，是一个与改良派所主张的“君主立宪”相对应的历史命题，它显示了辛亥革命的主要内容和主要特征。民国成立后，由同盟会改组成的国民党把“巩固共和”作为自己的一项主要政纲。后来，革命党人发动“二次革命”，参加“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都认定是捍卫共和国制度的斗争。

不同史观的学者对辛亥革命性质有不同的界定。中国大陆学者认定其为“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台湾学者有人论定它是“全民革命”。如果我们从这场革命的本义立名为“共和革命”、“共和革命思潮”，各方面学者似乎都可以接受。清末共和革命思潮是洋务、维新之后的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高层次的近代化思潮，它的一个显著特征和重要的历史功绩即在于它比较完整地凸显了近代国家理性，欲图建立一个独立的民族共和国，并以此为杠杆，使中国实现近代化。这一点可从孙中山为代表的近代国家思想和包含“从同”（“循常”）和“超越”这种历史悖论式的社会发展思想中得到说明。

近代化是一个带有某种普遍性的世界历史进程，近代世界自资本主义产生后，逐渐形成了世界市场和相应的国际关系格局，使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出现了某种一体化的趋势。对此，自孔德到韦伯以来的西方社会学家作了各种预测，马克思和列宁也曾作了许多不同侧面的说明。马克思在《资本论》

①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49页。

② 刘学照：《略论“共和革命”及其主要特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第36—37页。

中说：“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①列宁则说，“在全世界上，资本主义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的时代，是同民族运动联系在一起”。“建立最能满足现代资本主义这些要求的民族国家，是一切民族运动的共同趋势(趋向)。”^②孙中山的以三民主义为主要理论形态的共和革命思想是当时中国最安全的近代化思想，其富有近代理性，包含深广的世界意识和强烈的时代精神。他在表达自己的革命主张时，喜欢从“时代”、“世界”、“各国”、“近世”、“二十世纪”、“世界大势”、“世界潮流”方面去立论，他强调中国共和革命“必须学习西洋，与世界文明各国从同”。^③认为，“近世以来，革命思潮”，由欧渐美，“波荡于东亚”，“所谓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此世界所同，而非一隅所能外者”。^④他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说，将来的中华民国“是民族的国家，国民的国家，社会的国家皆得完全无缺的治理”。^⑤这是在创立近代民族国家这个历史课题上的“与世界文明各国从同”^⑥的意识。

孙中山的共和革命思想和近代化思想中的与“文明各国”发展“常轨”的“从同”(或谓“循常”)的思想集中表现在他的建立民族、民主国家和“振兴实业”的主张中。世界近代历史进程中所建立的民族国家其原型是西欧、北美的民族国家，通常被称为“国民国家”，包含建立主权“国家”和形成近代“国民”两个方面。前者的内涵是“民族”，主要是实现和保障民族的“独立”与“统一”，屹立于国际之林；后者的蕴义是“民主”，主要是实行改革，建立和完善民主宪政体制，养成国民的近代文明和创造性，以支持和监督国家。孙中山坚持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统一，强调要使中华民国成为如同美法那样的共和国家。孙中山早期的民主主义宣传，比较突出“反满”(主要理由是清廷腐败，不能保障主权和统一，同时它的统治又不合国民权利平等的原则)，但仍强调“满洲民族，许为同等之国民”，“革命党宗旨，不专在排满，当与废除专制创造共和并行不悖”。^⑦民国建立后，他一再强调“汉、满、蒙、回、藏”“立平等地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0页。

②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08页；《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1页。

③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第601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204页。

⑤ 民意(胡汉民)：《纪十二月二日本报纪元节庆祝大会事及演说辞》，《民报》第10号。

⑥ 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57页。

⑦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第343页。

位”，后又提出“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如同美国把“许多民族合起来”“成了美国一个民族”一样，“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造成在世界上独立自由的地位”。^① 后来他在广东又多次提出，“废除治外法权和收回关税自主权”是“必须迫切解决的问题”。否则，“中国就不能成为国家，也不能摆脱次殖民地的地位”。^② 在民权主义方面，他创立“王权宪法”理论，强调“民国主人翁为国民”，“国中之百官”“皆人民之公仆”，“皆系为民服务”，又强调“共和政体，以教育为根基”，“教育普及则知识自然平等”，宜“注意于国民建设能力之养成”，通过教育并促进以“县自治”为基础的“循序以进”的地方自治，“予人民以养成自治能力之时间”，“以养成共和国民之资格”。^③ 他始终致力于“创立民国”和“捍卫民国”的斗争，反对军阀割据和国家分裂，旨在使中华民国成为一个“民治、民有、民享”的具有主权国家、统一国家和法制国家等近代国家思想内涵的“国民国家”。这是孙中山“从同”（“循常”）思想的一个主要方面。另外，孙中山和共和革命派对近代化的“从同”认识又表现在他们的“振兴实业”的主张中。工业化是近代化的基础和中心内容，而市场导向是发展近代经济的基本特征和重要保证。孙中山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今尚用手工为生产，未入工业革命之第一步”，憧憬“农业的中国要变成工业的中国”。^④ 为此，力图在保持主权的条件下，实行开放主义，广泛吸引外资，与世界市场紧密连接，以促使中国振兴。他这方面的言论主张是一贯的，尤其是他著名的《实业计划》，展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复兴，研究国家共同发展中国实业，提出包括建筑十万英里铁路、开辟三大港在内的建设宏图，充分表现出坚持开放主义、放眼国内外市场的发展中国经济的战略眼光。这是孙中山在推行工业化发展近代经济方面与“文明各国从同”的思想。

孙中山的共和革命思想和近代化思想还有另一方面的特色，就是他在学习外国与世界“从同”、遵循文明各国发展的常轨（“循常”）时，又考虑时代的

① 《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 1985 年，第 187、394 页；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第 533 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 1986 年，第 119 页；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第 320 页。

③ 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第 76 页；《孙中山全集》第七卷，中华书局 1985 年，第 62 页；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第 17 页。

④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第 214 页；《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 1985 年，第 250 页。

因素和中国自身的特点,对这种社会经济常轨进行某种突破和“超越”。中国近代化是一种后发性的近代化。当孙中山领导民主革命、建造民族国家“企强以比欧美”时,世界资本主义已经步入垄断阶段的帝国主义时代,在西欧、北美,贫困、失业等各种社会问题日趋严重,一个国际性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崛起。这种情况,使以西方社会为“模范”、“目标”的中国革命党人,在思考中国未来发展时面临两难抉择。清末一些革命派人士在憧憬未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时,先后在《译书汇编》、《江苏》、《浙江潮》、《民报》、《夏声》等革命报刊上发表了不少对资本主义进行非议的文字(上述刊物均在日本编印),强调“欧美社会情形可鉴”,“于兴业处方中,加数点共同利益之膏药,以防日后国内撼动之祸患,生贫富大悬之等差”。^①孙中山是这批具有超前意识人物的杰出代表,他在“迎合世界之潮流”,强调“一定要发达资本,振兴实业”时,一再表达这样的看法:“欧美各国资本家,专横达于极点……往往多独占事业以资本操纵金融,人民受害不可胜计。”“我国将来实业发达,资本专制亦当不免,欲求幸免社会革命,莫如思患预防。”^②他比方说,进行社会革命如同“医病”,“与其医于已发,不如防于未然。吾人眼光不可不放远大一点,当看至数十年、数百年以后,及于世界各国方可。”^③这样,既要与世界各国“从同”以“振兴实业”,“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又要“防于未然”,即“防止”资本主义的弊端,对这种生产阶段进行某种“超越”。这种既要“发展”,又要“防患”,既要“从同”,又要“超越”,作为一种历史悖论被包容在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中。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包含产业革命(“振兴实业”)和社会革命(“防于未然”)两方面内容。他把民生主义作为社会革命的纲领表达时,侧重谈到“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个问题。平均地权的主要思想来源于美国亨利·乔治的《单税法》,主张在革命成功后核定地价,以后因社会经济发展而地价上涨,其原价归原主,增价归国,以防止私人土地垄断。所谓“节制资本”,主要是节制企业之“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他说,“不单是节制私人资本,还

① 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第400页。

② 《民生主义第二讲》,《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41页;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补编》,第96页。

③ 《在南京同盟会员饯别会的演说》,《孙中山选集》,第94页。

是要发达国家资本，即用国家的力量来振兴工业”。^① 他自称这是“采国家社会主义政策”。^②

共和革命思潮是 20 世纪中国变革思潮的开端。

首先，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提出了建设民族国家的任务。建立民族国家是世界各国实现政治近代化的一项普遍性历史课题。近代中国是在不平等条约的羁绊下开始近代化历程的，近代化和半殖民地化同步进行。建立具有独立和民主内涵的民族国家更是实现近代化的重要前提和根本保证。在洋务偏误、维新夭折、清政府由于自身腐败又丧失改革时机，难以完成由传统国家向近代国家转变的情势下，以孙中山为旗帜的共和革命潮流，用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凸显了建立民族国家的时代课题，又用民生主义规定了“振兴中华”的社会发展目标。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摒弃了朝廷代国家的传统国家观，正式揭橥“中华”国号和“中华民族”族号，把建立中华民族的独立、统一、民主、文明、富强的共和国家提上历史日程，在中国国家发展史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开创的意义。孙中山在“创立民国”和“捍卫民国”的斗争中，主张“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的流弊”，用“外察世界潮流”和“内审中国国情”的办法，产生全美的宪法，凌驾欧美之上，“作成一中西合璧的中国”。这样的国家目标和理想对中国近代化进程起了很大的引导和推动作用。^③ 孙中山所倡导的共和革命潮流导致了传统国家清朝统治的崩塌和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的建立。但是，这次革命变革缺乏“中等社会”做基础，是一次乏力的革命，未能进行有力的改革，更未能引导“农村大变动”，所以缺乏近代民族国家所应有的社会基础。民族国家被军阀所掌握，貌新实旧，无法实现由传统国家向近代国家的制度转变。正如早先陈天华在《中国革命史论》中指出：“泰西革命之所以成功者，在有中等社会主持其事；中国革命之所以不成功者，在无中等社会主持其事。”^④ 虽然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到 20 年代中后期，中国民营资本曾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军阀统治的夹缝中一度有过较快的生长，但是并无力量单独对抗国际资本和国内的官僚地主势力。1927 年国民党在北伐战争胜利的基础上建立起国民政府，对内发展工业，对

① 《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 120 页；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第 174 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 1981 年，第 298 页。

③ 《孙中山选集》，第 800 页；《孙中山全集》第四卷，中华书局 1981 年，第 332 页。

④ 《中国革命史论》，《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第 224 页。

外进行修约、收权的活动,发挥了较多民族国家的功能。但随之而来的军事政权的官僚化和资产化,控制和垄断经济,资产阶级的发展受到新的抑制。它又忽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与变革,像民国建立以来的历届政府一样,无法使自己的统治稳固。加之,从 30 年代起,日本的军事侵略逐步扩大,到抗战前夕,国民党政权大约只是在全国 25% 的土地上对 66% 的人口建立了有效的统治。经过抗战,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但国民党“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垄断急剧加强,民族资产阶级不断增加,广大农村封建依旧,中国最终未能完成向民族国家的转变。既然近代中国始终未能树立起比较可靠的“中等社会”,又未采取任何引导“农村变动”的措施,最后从共和革命潮流中始建的民族国家只能改换新的模式。1949 年,在旧有国营经济(占现代工业 70% 以上)和“实现农村大变动”的基础上建立的新中国,标志着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成(独立自主、社会认同)。

其次,共和革命开启了 20 世纪中国激进潮流的曲折道路。

社会变迁有渐进和激进或说社会进化和社会革命两种形式。共和革命思潮无疑是一次激进的政治潮流。20 世纪最初的十年间,革命论倾向的刊物中大量文字宣传“破坏”、“激进”、“革命”,如刘师培署名“激烈派第一人”发表《论激烈的好处》的文章,主张“实行破坏”,说一种治新学的人,看几部《群学肆言》等书,“便满嘴的说平和的好处”。中国就误在“平和”两字,误在“待时”两字,要知道是“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事,“中国古时候的英雄,如陈涉、项羽一般人……到了没有法子想的时候,出来闹一闹,遇着机会,他就可以成功了”。^① 他们又宣传“天下只有穷人有革命资格”。^② 大量文字宣传美、法革命,强调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这种“自由花发春何处,革命风潮卷地来”的情况,主要是“传统政治构结”(代表清政府)衰败无法应付内外环境所致。当时《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等刊物上有文章说“上等社会既误于前,崩溃决裂,俱待继起者收拾之”。^③ 撰这些文章的学生自认为“介于上等社会和中等社会之间”,是“中等社会”的代表,“革新的健

① 刘师培:《论激烈的好处》,《中国白话报》1904 年第 6 期。

② 林白水:《说穷的好处》,见林伟功主编:《林白水文集(上)》,福建省历史名人研究会林白水分会 2006 年,第 216 页。

③ 李书城:《学生之竞争》,见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0 年,第 453 页。

将”，是“下等社会的指针”，负有“提携下等社会以矫正上等社会”、“破坏上等社会以卵翼下等社会的重责”。^① 他们认定，“挟持政柄”的“上等社会”既已腐败、迟误，“推诚布公之改革，既已不可得，则其改革之权，势不得不操之于在下者之手也”。^② 也就是既然无法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便不得不进行自下而上的革命。可以说，共和革命思潮之所以采用激进主义（即革命主义）的办法，完全是中国政治结构衰败的结果。

共和革命导致清朝的覆亡，但是从帝制的废墟中并未自动出现一个现代型的民族国家，而是分裂出大大小小的传统型权力中心，形成严重的政治权威危机。从清帝退位的十多年间，挂着民国招牌的北京政府并不能统一号令于全国，陷于政治分裂和军阀混战的局面（有人统计，1912—1928年间大小内战达140次之多），杨幸之在《论中国现代化》（1933年7月）中发问：“这样又能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吗？”而外部环境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民国建立后，“青岛问题”、“二十一条”、“巴黎和会”、“五卅运动”、“九一八事变”……形成了甲午战争以来最为严重的形势。中国中下层社会势力已无法容忍上层社会衰败和分裂的状况，强烈要求结束纷争，重建民国。“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以及20年代的国民革命接连发生。又受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孙中山和国民党“以俄为师”，毛泽东和共产党“走俄国人的路”，中国变革潮流仍在国民层面上的激进的革命道路中演进。政治结构的衰败招致了近代化进程的曲折和缺乏连续性，又加深了传统文化的危机。鉴于中华民国的有名无实和文化保守主义的抬头，一个文化激进主义运动以《新青年》杂志为主要阵地蓬勃兴起。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人对传统文化进行激烈的批判，欲图进行一场通过新的文化灌输能使国民在思想文化上发生一次革命。文化上的激进主义和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并行不悖，有时这两个潮流相互为用或合而为一。这是从共和革命潮流以来20世纪中国历史变革潮流的一个新特点。

共和革命思潮是一个以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居于主导地位的一种多元思想的复合结构（革命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早期社会主义宣传、“国粹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等），但在自由、民主、平等的宣传中更为关注的是民族的自由

① 李书城：《学生之竞争》，《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2期；杨笃生：《新湖南》第2篇，1903年。

② 寄生（汪东）：《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见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第129页。